

讀者參考



①

从姜文到王志文
一个女作家的自白
文人不必太清高
杨丽萍与托尼的情缘
体育明星的浪漫曲
战胜国的宽容和战败国的挑著

學林出版社

目 录

观察与思考

- 4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教育?
- 7 明天,谁来种粮食?
- 12 房改:思想能不能再解放一点?

天下事

- 19 中东和平的正戏
——叙以和谈的前景分析
- 23 美国的“融合欧洲”战略
- 26 日本人精明?愚蠢?
- 28 战胜国的宽容和战败国的执著

人物春秋

- 30 从“小铁梅”到“佛门居士”
- 35 艺术家出道的企业家
- 38 浪漫钢琴王子克莱德曼
- 40 毛远新的过去和现在

社会透视

- 44 张贤亮:文人不必太清高
- 49 悄然上岸的下海文人
- 54 孩子,你还缺什么?

文艺园地

- 60 中国文化艺术的世界意识
- 63 从姜文到王志文

- 68 流行乐坛新态势

- 70 ‘95 中国影坛

婚恋与家庭

- 72 杨丽萍和托尼的情缘
- 74 夕阳无限好
- 76 奇妙的恋爱效应
——体育明星的浪漫曲
- 78 婚姻不是科学

世态风情

- 80 冲浪生活
- 83 谁踩了北京人的脚
- 84 在音乐厅打工的研究生们
- 86 上海夜总会时装表演一瞥

随感录

- 87 玩象征
- 88 义齿
- 90 作家学者话麻将

作家与作品

- 92 读不完的苏童
- 95 一个女作家的自白
- 101 “洛伊宁格尔”与他的“第三只眼睛”

中外书摘

- 107 《廊桥遗梦》梗概

体育天地

- 113 中国女子游泳缘何出现质的飞跃?

科技动态

- 116 世界新科技革命的走向

经济生活

- 120 中国富裕群体收入调查
121 中国人的汽车梦

港澳台之窗

- 125 香港和国内文化的双向负反馈
129 香港趣事录
132 台湾:“四小龙”地位难保

国外见闻

- 133 世界性中文热的兴起及成因
137 美国家庭短镜头
139 PBS——美国的公共电视
140 英国人法国人互相看不惯

九州方圆

- 142 我国城市增至 620 个
142 国务院前后三批公布的我国 99 座历史文化名城
142 浦东崛起“万国建筑群”
143 昆山将建世界名人城

- 143 2000 年将有 30 座长江大桥
143 上海有了水族馆
144 邹城拍卖干部违纪房
144 上海“两桥一道”将“出嫁”
144 中国信息市场将矗立北京西郊
145 北京的古旧市场
145 沪上流行商业广告信函
145 杭州出现“快餐巴士”
146 沪上出现十种上门服务
146 京城消费怀旧味浓
147 广西有个无人售菜市
147 无证可作海南行
147 广州城寻到了根

改革信息

- 147 朱镕基预期:我国后年步入市场经济轨道
148 金融改革 步履维艰
148 人事管理权应基本下放企业
149 社会保障制度将有较大改革
149 国家决定年增 20 亿扶贫资金
149 沈阳实施官员利益申报制度
150 国家将向社会乱评优“开刀”
150 北京将征收城市容纳费
151 北京公布失业救济金标准
151 蚌埠抵押贷款售房
151 黑龙江拍卖“五荒”
152 合肥试行“探长制”

新论点·新见解

- 152 中国近期改革的新特征
152 当代中国社会利益结构的變化与政治发展
153 制约我国股份制大规模发展

的五大因素	包分配
154 中国需要大批“买办”	25 女王铁闻
154 市民心态的新内容	27 日本人获诺贝尔奖少的原因
155 市场经济下文艺发展的三种模式	53 现代化国家的标准
155 与现实的隔膜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种不足	59 上海三万娃娃学英语
155 要重视书文化的建设	62 最受欢迎的一句话
156 文化雅与俗的三个差异	67 北京将建缩微圆明园
157 应重视人格形成的教育	71 上海就业结构出现白领化趋势
158 建议取消政治中考	85 成都靓女掏钱上挂历
159 农业要走精致化道路	※ ※ ※

补白

6 2000年后上大学全是自费不

160 《读者参考》1995年征订通知

《读者参考》丛书 博萃广荟

副主编：林 雨

编辑：《读者参考》编辑部

地址：上海金沙江路长风二村 51 号 15 楼 1 室

邮政编码：200062

出版：学林出版社 地址：上海文庙路 120 号

邮政编码：200010

邮购：学林出版社读者服务部

地址：上海永嘉路 25 弄 8 号

邮政编码：200020

发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刷：丹阳市新华印刷厂

印张：5

字数：18万

责任编辑：金 辉

封面设计：朱 文

ISBN 7-80510-959-1/Z·63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定价：3.00 元

教师教得不能再苦了，
学生学得不能再苦了，
家长拖得不能再苦了——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教育？

康健·段跃

记者：应试教育害人，也害教育。这种说法大概六七年前就有，而改革应试教育的呼声更是一年比一年高。奇怪的是在实际生活中应试教育并没有得到明显改观，它依然作为整体教育制度的指挥棒，纹丝未动。对此，很多人感到疑惑。

康健：应试教育在近几年虽然屡遭批判，但没有受到遏制，反而愈演愈烈了。为什么？原因当然很多，但有一点很明显，我们实际上是容忍和默认了升学考试作为教育的方针和目的这一事实。

中国教育有两大难题，一是中国需要教育，二是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实际上，近几年我们着重解决的是第一个难题，对于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教育还没有顾及到。其实，这个问题比第一个问题更难解决，对下个世纪的中国也更为重要。整体上说，我们的教育是很陈旧的，在某种意义上，它类似于中国科举教育的传统，也类似于英国公学和

文法学校的教育传统。尽管这些传统都持续了很长时间，但它们与现代社会毕竟是相距久远了。在现代社会，教育不再是少数贵族的装饰，不再是升官晋爵的唯一通道，它已成为每个人自身发展的需要，成为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和公民的基本权利。但今天的教育，从观念到体制、方法都还不能适应这些需要。应试教育，就是这种不适应的集中表现。所以我一直以为，应试教育不是一个简单的考试制度问题，它涉及到中国需要什么样教育的大问题。

记者：那么应试教育和考试制度有什么区别，应试教育究竟错在哪？

康健：应试教育就是以考试为目的的教育。其实考试制度在现代教育中的作用很有限，比如高考，目的很单纯，就是用一个相对平等、公平的方式选拔能够受高等教育的人。它不解决教育的所有问题，也

不解决选拔人才的所有问题。如果把教育制度比作一条长长的链子，那么考试制度仅仅是当中的一环，即使是这一环，也并不令人满意，人们正试图用各种方法完善它，克服它的弊病。应试教育就是用这样一个有限的、需要完善的考试制度来引导整个教育制度，是在动用国家庞大的教育制度来为这个有限目的服务。它就像一个大筛子，用一样大的筛子孔，筛选不一样的人：你想上大学就得参加高考；你想在社会上有地位，就得参加高考；农村的孩子想进城，就得参加高考。结果呢，100所中学有90所“剃光头”，100个孩子，有90个灰溜溜地走出校门，选拔优胜者的代价是让大多数人失望。这种以分数为唯一尺度淘汰大多数的做法，极大地侵犯了教育平等的基本思想，侵犯了教育要使人得到全面和协调发展的根本目的，同时也很难使教育促进社会的进步。所以我一直有个想法，教育经费的短缺固然在很大程度上拖了我国教育的后腿，但教育体制的改革，教育观念的更新同样很重要。钱不能直接转化为教育质量，钱不能直接转化为现代教育观念，钱也不能直接转化为现代化。

记者：照您的说法，中国教育的落后不仅是物质上的，同时也是体制上的，观念上的。

康健：是的，比如基础教育就存在很大问题。多年来我们说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升学的基础，从

小学到初中，到重点高中，一直到大学。

那么在现代教育观念中基础教育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先说基础，我不同意塑造人才的说法。基础教育首先是培养人。人是第一位的，首先是给孩子的一生打好基础，让他有更强的社会适应能力，迁移能力，创造能力，有更全面的发展。而不是从一开始就是定向的，给孩子定得很死，将来只能干这个，就像计划经济那样。第二，基础是整个一代人的基础，也就是21世纪我们中国发展的基础，我们必须考虑未来究竟是怎样的，它需要什么样的人。这是要有远见的，而不是说我们今天考政治就念政治，明天不考生物就不念生物。这不是基础，基础是不管你考不考都必须有的，比如环境的意识，伦理的意识等。

再说教育，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人们把教育和训练弄混了。因为高考指挥棒的作用，我们的学校实际上是在做一种升学者的训练工作。训练是必要的，但训练绝不可能出现天才，它只能使人在技巧上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通过训练你可以进重点大学，也可成为匠人，但创造性和人的全面发展在机械的训练中只会受到抑制。而教育呢？它是一个环境，一个氛围，一个整体影响的过程。我们的教育恰恰是丢了作为整体的影响过程，把训练抬到了首位。在学校，经常是音乐课、体育课随便被语文课、数学课

挤掉，表面上看，它保证了升学和考试成绩，而实际上却是在强化了一种训练的同时，否定了教育。所以，我觉得对基础教育的再认识在当前是很重要的，长此下去，中国教育的危机恐怕更深刻。

记者：从您刚才对应试教育的分析看，这是一个难解甚至无解的题，在没有一个新的东西取代它之前，我们只好坐而待旦了？

康健：可以说，这么多年来，应试教育一直处于两难境地。谁都知道应试教育是有百害的，但如果不用它，也许更糟。走后门、不正之风问题怎么解决？热衷应试教育者则认为：如果不强化升学考试，孩子读书的积极性怎么刺激？不考，学生还念书？还上大学？由于应试教育已成为整个教育的导向，所以稍有动静，将如“牵一发而动全身”，没有点改革魄力，没有点全面改革的意识，就无法突破。

为什么应试教育说起来可惜，改起来却步履维艰？就教育内部而言有两个原因，一是教育的遗传惰性，教育一旦形成了它的体系，是惰性最大的，它涉及了课程、教材、教学、教师等一系列问题。二是惰性使人们失去了探索和接受新事物的勇气和能力。人们宁愿守旧，走照本宣科，死记硬背，考试高分一条路，却不愿意甚至不能够再开一门新课，再讲一本新书了。长期的应试教育不但把孩子毁了，也把老师毁了，老师的退化不亚于孩子，

而且比孩子更可怕。当一个教师退化为一部古板的机器时，他怎么能用自己人格的魅力和知识的穿透力去影响学生？

怎么办？我认为一要政府努力，二要有一批有社会责任心的教育改革家。政府的努力就是大力提倡改革，给政策，支持改革，保护改革，不管是失败还是出现曲折都应该这样。今年的教育工作会议，政府就明确地表了一个态，提出教育的根本出路是改革。而有社会责任感的教育家，就要拿出具有先进水平的思想理论和实验结果。现在第一线工作的教师很难有精力和能力从事这些工作，专业理论工作者，又高高在上，不屑于对实际问题进行研究。

可能我这个人太理想主义了，我认为，应试教育这套东西绝不能带到下个世纪去。我们必须努力。

（摘自《中国青年》1994.9.）

2000年后上大学 全是自费不包分配

国家教委主任朱开轩近日说，高等学校将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新体制，逐步实行学生缴费上学，大多数毕业生自主择业。1997年大多数学校按新制度运行，2000年基本实行新旧体制并轨。

（摘自《蜀报》）

明天，谁来种粮食？

柔 水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在工业高速增长的今天，农业农民问题日益加重，给中国改革的前景蒙上了阴影。

发展农业是全国人民的共同事业，是全社会的责任，而不仅仅是农民的事业、农村的责任。

那么，农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

——伴随着1992年以来国民经济超高速增长，受经济运行动力机制的控制，国家经济政策大幅度地向工业倾斜，与此同时，农业却受到广泛而又严重的忽视。

随着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急剧膨胀，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却在迅速下降；随着经济的超高速增长，农业生产却连年滑坡；随着生产资料价格的飞速上涨，农副产品价格却在不断下跌；随着货币的超历史水平的投放，农民手中的白条却在大量增多，随着农民收入的相对恶化，农民的不合理负担却在与日俱增。

农村工业化的迅猛推进，城乡人口流动闸门的开启，使工农业之间的收益差别公开化，随着粮食生产的成本增加，种植业几乎无利可

图甚至蚀本，政府和农民对农业的土地、劳动、资金投入大幅度下降，农业增长形势极为严峻。

没有投入就没有产出，
农业是包袱吗？

没有投入就没有产出，这是超越部门、超越体制、超越阶段的规律，农业亦如此。

社会对农业投入不足直接表现为：耕地面积急剧减少，抛荒面积上升，复种指数下降，资金投入缩减，劳动投入减少。

中国耕地仅占世界耕地总面积的7%，人口却占总人口的22%，人均耕地1.8亩，远远低于人均5亩的世界平均水平，40年来，却以每年300—400万亩的速度锐减，90年代，这一速度又上新台阶，1991年全国耕地减少732万亩，1992年又在1991年的基础上翻了两番。

目前中国已有大大小小的开发区2700多个，占地约2250万亩，80%是优良田，但真正派上用场的不足2%。浙江某市采用现代化手段“汽车闾地”，仅半年就让出800多公顷土地，这是“跑马闾地”时代难以想象的。还有不断升温的高尔夫球场热。现在，粮棉油的复种指数

急剧下降，甚至出现大面积抛荒。1992年，仅浙江一省抛荒的土地竟有200万亩，占其全省耕地的8%。

农业部1993年赴湖南综合调查结果，1993年湖南省粮油作物面积急剧减少，夏粮、油菜籽、早晚稻减幅都在15%以上，油菜籽减幅达30%，全省1993年的产量比1992年低了7个百分点。

由于化肥大幅度提价，很多地方耕地已经成了不施肥料的白田。

技术上的投资更少，据统计，在农村就业人口中，文盲、半文盲占36%，扫盲和学文化技术班没钱开办。据1989年对广西南平县4个乡镇80户农民的调查，80户农民技术培训费竟然为零。在农村，科技推广，农业技术人才出现青黄不接局面。

即使农业技术人员不缺，可他们连推广技术的对象都没有。在今年3月份召开的全国人代会、政协会议期间，一些代表痛心疾首：“农村只剩下3860（妇女和老人）部队了。”在不少地方，18岁至30岁的青壮年都走得差不多了，致使农村整整缺了一代人。

投入不足将是导致农业滑坡的主要动因之一，而投入不足又分两种情况，即传统型投入不足和市场型投入不足。

市场型投入不足是由于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比较收益低，投入成本高甚至倒贴钱，使农民深感种粮不划算。农民虽老实，没文化，

却不是傻瓜，因而农民手中有限的资源和资金向收益高的非农业流动。农民对农业的投入减少主要是市场型的。而市场型投入不足也是由传统型投入不足带动的。

传统型投入不足是由于国家的经济政策大幅度地向工业倾斜，这种倾斜使有限的资源流入工业，农业长期处于贫血、饥饿状态。甚至不惜以损害农业为代价，特别是在短期行为机制下，更是如此。

农业的波动主要是由于政策的变动，但与以往历次农业波动不同，即使是传统型投入不足也有了新的特征。财政实行“分灶吃饭”后，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并没有划分增加农业投入的责任。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发展农业的责任不清，甚至实际上互相推诿。尤其是当前举国上下一片经济超高速增长的高呼声中，农业倒像是个大包袱，被踢来踢去。

雁过拔毛与唐僧肉

农业的失血不光是国家的政策问题，它所包含的内容极为深厚……

国家每年拿出几十亿资金用于农业开发，就这有限的资金的使用情况如何呢？

国家审计署1993年初曾对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农用资金进行审计，结果表明，大量资金滞留在省、地两地，县级财政用于农业的资金极少。一些地方政府主管部

门挤占挪用农业资金。有一个省政府主管部门超编3000多人，两年挪用1500万元，用于行政经费开支，还有一市的河湖指挥部将250万元农业资金用于创办实体。仅山西省农业银行截至1992年底统计，全省用于农业转入非农业资金达30亿元左右，甘肃省1991年全省农业资金36%不到位，1992年又有22%资金不到位，达1.3亿元。

本来就脆弱的农业，却有那么多“黑手”伸过来，好像唐僧肉，谁都想吃一口。

金融机构首先把触角伸向农村。现在各大大专业银行和邮政部门在乡镇一级均设立了分支机构，据专家调查分析，农村资金至少40%被专业银行吸收到城市非农产业中。

社会债券抽走大量农业资金，社会集资更是釜底抽薪。

支农资金严重走穴。银行、粮食部门、信用社和各种农村合作基金会都有占用农业资金投向工业的现象。1992年，国务院拨付收购资金800元/人，按预定的收购量，资金不成问题，可到基层只剩下大约1/3。

钱都干什么去了呢？据某审计局的专项调查，无非是盖办公楼、宿舍楼，购买、更新轿车，有的出于无奈填补了人头费的缺口。

受市场比较利益的诱惑，在全国范围内资金由农业向非农业流动，由农村向城市流动，由不发达

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各地将一切能支配的资金都用于搞基建、上项目、铺摊子、搞开发区，这其中包括本应用于收购农副产品的资金。

“卖粮难”和“白条”的背后

这几年，卖粮难成了爆炸性的社会问题。粮多贱卖，甚至积压、霉烂、变质。由于种粮损失惨重，个别粮农因承受不了而自杀。陕西省扶风县，是陕西主要产粮区之一，七五期间人均农业产值5年增长0.52元，仅够一个鸡蛋的价格，若剔除成本，每年只增长几分钱。产粮大省湖南省，1992年稻谷价格为50公斤20—22元，比上年的29.2元下降28%，可成本却上升到34元以上，这还不算劳动力。福建农民邱建平，承包耕地65.7亩，1993年售粮3万公斤，由于每亩要赔进10多元，这3万公斤谷子卖给国家后，他要倒贴1000多元。一位农业大省的领导说，他们是“背着包袱种粮食，种了粮食背包袱”。

“卖粮难”和国家库存增多的问题，真的是因为粮食生产过剩了吗？试想如果全国9亿农民每人每月多吃0.5公斤肉（即使如此，农民的消费水平仍然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若按1:5的肉粮比换算，全国粮食需求量将增加270亿公斤，不仅目前“卖”难的问题完全解决，还会出现买难，但是我国农民还吃不起这么“多”的肉类食品。一个月0.5公斤，一年就是6公斤，每公

斤按8元计算，则农民人均年支出要增加48元，就是在农村经济大发展的80年代，农民人均纯收入每年增加额平均只有40多元。说到底，还是由于中国人民太穷，特别是占人口80%的农民太穷了。

因此目前的供过于求是低水平上的相对过剩，是有效需求不足。卖粮难，有效需求不足的最根本的经济原因是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日渐拉大。

目前，中国的粮食的价格低于价值的30%以上，而工业品却高于价值的14.4%。1991年以后，工业品价格连续上涨，而粮食收购价继续下降。农民反映道：“粮食一分一分地微调，化肥一百一百地提价，农膜一千一千地涨价，农机一万一万地升价”，“工业品一年几个价，粮食几年一个价”，这充分说明工农之间，城乡的利益分配格局严重向工业和城市倾斜，农民利益受到极大损害。

变相的剪刀差危害更烈，伪劣农药、化肥、农机、假种子纷纷登场。农业部最近对5大类49种用于农业生产的工业品抽检，合格率仅为40%，并且这种坑农害农事件还在继续增多。

在农产品价格连年“明码”下跌的同时，农产品价格“暗码”下跌也愈演愈烈，这突出反映在农产品收购过程中的“白条”现象上。前几年且不说，就在1992年改革开放进程加快、经济超高速增长的形式下，

农民手中捏了上百亿元的“白条”，⁷这一次，范围之广、数额之大、滞留时间之长、影响面之宽都是前所未有的。

农产品收购资金的来源本应是由财政、人民银行、有关专业银行和粮食企业共同筹集的，目前各个部门职责界定不清，一家不到位、家家不到位，你挂帐、我也挂帐，年年打白条，谁也不负责。

有些地区，多年来一直把农村信用社的资金拿来作为收购资金。信用社的资金是农民的钱，拿农民的钱收购农民的粮还打白条，这体制是不是坑农民太甚？更有些地方拿供销社卖不出去的劣质商品抵白条，农民有苦向谁诉说？中国农民是无依无靠的，下一年全部衣食之需全靠当年出售农产品来保证，而农副产品收购部门在收购农民的血汗产品时，付给的不是现金，而是不能流通的“白条”，这等于断了农民的生计，并阻断了农业生产的正常循环过程。“白条”对农民的损害与副产品的明码跌价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白条所反映的不仅仅是资金供应问题；它实质上是中国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经济运行中各种矛盾的集中反映。它反映出中国价格体制、农产品收购和流通体制、资金管理体制、粮食经营机制已完全不能适应当前农业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白条”是对中国改革的严峻挑战。

谁来保护中国农民

工农业增长速度的悬殊，造成工农业不同步增长，在剪刀差作用的基础上，又加剧了城乡居民收入的不同步增长。1993年第一季度，城市消费品零售额比去年同期增长24.7%，而农村仅增长8.4%，若剔除价格因素，农民的实物消费量所增无几。目前，种植业已不能使农民的收入增长。在1992年农民人均所得收入增加的92元中，来自非农业占75%，而来自农业内部的占25%，其中，种植业仅占9.8%。这表明，那些以农业为主的农民，其收入水平并没有多大的提高。

在农民收入状况恶化的同时，社会对农民的巧取豪夺却在日益强化，农民的负担极为沉重，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农民负担除去税金和剪刀差以外，还包括社会性集资、摊派和管理性收费、罚款，乡村集体经济内部提留统筹和劳务等。现在名目繁多的乱集资、乱收费、乱摊派和乱罚款极为普遍。因农民负担过重引起恶性事件，农业部、监察部根据各地上报汇总，1992年共发生24起，其中17起酿成农民自杀身亡、逼死人命或毒打致死的惨剧，死亡17人，伤16人。四川仁寿县因扩建国道向农民人均集资70多元引起广大农民的强烈不满，上千农民包围乡政府，烧毁公安警车，致使乡政府一度瘫痪。1993年上半年，又发生10起加重农民负担

的恶性事件。安徽省利辛县农民丁作明上访反映本村负担过重问题被毒打致死。

造成这一切的根本原因，一是中国广大农村正处于工业化的初期阶段，工业化的原始积累的任务极为沉重，在城市工业自顾不暇的情况下，国家不可能对农村工业进行投资，因此农村的各级地方政府只好“自力更生”，在管辖区内实行社会主义原始积累，重复1978年以前的工业化战略。在人民公社和统购统销制度取消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为了加速本地工业化进程，只能利用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乱罚款的办法，从农民那里剥夺农业剩余，为工业进行原始资本积累。二是中国财政上就存在减轻财政负担和减轻农民负担的矛盾。

现实财政体制导致一种倾向，只要不向财政要钱，甚至能给财政交点钱，那就什么办法都可出台。于是，为“养人”和“部门建设”相继出台大量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甚至层层提留、上下勾结、狼狈为奸，这种分赃机制使各级政府职能部门把管理职能和部门私利巧妙地结合起来，为我所用，互相包庇，并且彼此之间互相仿效，变本加厉。这是中国社会中最大的不公正和最大的腐败现象。

农业问题实质是农民问题，实质是农民和市民的关系问题，是农业和工业的关系问题，是农村和城市的关系问题，它所包含的社会政

房改：

思想能不能再解放一点？

方进玉 李 勇

人们要问：既然邓小平早就提出了很好的房改总思路，既然党内党外、干部群众，对房改的必要性也已形成共识，那为什么中国的房改在走过了一波三折的漫长之路后，仍未能走上良性循环、一片坦途的“金光大道”？

寻根究底，是不是因为在一些观念上还有障碍？

城镇住房建设：

成绩大，问题似乎也大？

房子！房子！城镇居民需要房

治经济内容极为深厚。当前在中国，占总人口80%的农民的利益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中国的政府机构都位于城市，它和城市、和市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在与政府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市民具有较强的谈判能力，而农村的分散、落后、闭塞和愚昧，使农民在政治谈判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而且政府又严格有效地制止了独立于政府的农民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城市对农村的统治、市民对农民的统治的根源是城乡二元结构。

从现在起至2000年再到2020年，是社会经济发展极为迅速，社

子！

住房地基刚刚开挖，领导家里已挤满了哭哭啼啼的住房困难户；取到了住房证，却有人先撬开门锁占了房，不得不请领导来“调停”；两代甚至三代同堂，白天摆开桌子，晚上放下吊床……

这情景，家住城里的人自己没经历过也肯定听说过。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算是“宽松”的，但一位房管处长在接受采访时抱怨说：我们也难，每年新分的大学生和转业干部，至少需要30套房

会结构变化极为剧烈的时期。人口仍在增加，耕地大面积减少，人们的消费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生活由温饱向小康迈进，而粮食供给增长缓慢，因此力争2000年中国粮食供需平衡将是极为艰巨的任务。如果目前中国的农业政策持续下去，谁还愿意种地，2000年，中国人吃什么？

本文系据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康晓光副研究员的报告《我国农业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编写而成。

（摘自《视点》1994.9.）

子；每年干部的孩子长大，不能同居一室，这算自然增长；干部提职、处长、司局长的住房标准有规定，你手里也得有房；好不容易辛辛苦苦把住房问题基本解决了，机构合并，人员定编，房子解决了的干部纷纷调走，留下来的，又有一批房子还没解决的干部……

机关难，但比起某些企业又算不得难。这是天津重型机器厂所处困境的摘要：

这家以制造机械、冶金、船舶、发电等大型非标准成套设备的大型骨干企业，有职工万余人，在连续几年赢得微利之后，于1991年进入亏损行列。

厂子亏损，房子更缺。该厂的分房规定是：三口之家，如果住房总面积超过7.5平方米，即没有申请新房资格；三代同居一室、人均居住面积在3.5平方米以下、两个子女年龄都在16岁以上的职工，可申请住房。

提出申请并不一定就等于“有”新房住，因为即使按照这一苛刻的规定算下来，该厂排队等候的职工竟然有3000多户！

新分来的大学生，结了婚却又请了长假回家去等分房；中高级技术人员和一线技术骨干因为没房两年时间“流”走了217名；怀了孕的女职工因为没房，甚至不得不去人工流产……职工愁，领导更愁，要想实现本世纪末天津人均住房面积8平方米的目标，该厂测算的结果是：

需要资金6720多万元——对于一个亏损企业来说，这几乎是一个“天文数字”（该厂1992年开始房改，据悉正在逐步走出困境，不赘述）。

中国有多少这样的企业？

中国有多少这样缺房户？

我们的政府和企业领导丝毫也没敢“闲”着。

我国城镇住宅建设的成绩并不小，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的1979年——1993年，全国新建城镇住宅20.25亿平方米，这一期间，我国人均住房面积由1978年的3.6平方米提高到1993年的7.5平方米，各地城市仅建筑面积在5万平方米以上的住宅小区就建成4000多个。

另据统计，1978年至1988年的十年间，我国城市住宅投资总额是前三十年的5.6倍，住宅竣工面积是前三十年的2.3倍，据联合国统计，十几年间我国住宅建成数量和人均居住面积的增长量，均居世界前列。

可是，问题仍然不少。

分析其原因，中国的人口基数太大，增加太快；国家百废待兴，住房建设资金不足，苦乐不均，有人以权谋私多占着住房……

多少人把希望寄托在房改身上！

可是，有专家指出：中国的房改还有待从理论上进一步突破“禁区”。

禁区之一：中国，能不能允许个人拥有不动产？

按照以往的社会主义理论，私人似乎不应该拥有不动产。从建国之初对工商业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到“文化大革命”，我们革命的“目标”都倾向于限制或者剥夺私人不动产。

“文革”中，如果有人被戴上“私人房产主”的帽子，其命运不是被批判就是被揪斗，而那属于私人的房产，几乎无一例外地被“没收”了。记者的一位朋友，家住北京南河沿，他的父亲本是教员，但因为祖上留下了一座四合院，因此“文革”一开始就惨遭批斗致死。院子里原本和睦相处的邻居们占据了向阳的北房，他家则被迫搬到西厢房，一月20多元的房租也没人再交了……这一切，是在“文革”结束后才得以平反的。

1980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按照邓小平同年4月关于住房改革思路的著名谈话明确指出：准许职工私人建房、私人买房，准许私人拥有自己的住宅。要有计划地由国家建设一批住宅，向私人出售。房价可以一次付清，也可以分期付款。一次付清的，应当享受优惠待遇。

回顾历史，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走过这么一段弯路：没有私人房产，国家把一切都包了下来——住宅由国家、单位承建，住宅

被看作是社会福利进行分配，绝不具备商品的属性。可是，这样搞了许多年之后，社会主义国家的住宅问题似乎都还没能很好解决。

前苏联因为人口较少，其住房问题算是解决得比较好的，但现在俄国住房问题仍然困扰着该国政府，因为即使俄国政府现在想把住宅“白白”送给居民，人们也不愿意接受——数十年的“娇惯”，把前苏联的居民给“宠”坏了，人们不愿意接收那“白给”的住宅，因为害怕将由个人承担住宅维修费。

中国，正在快步走出这一“福利住房”的误区。

在刚刚结束的全国房改领导小组会议上，人们就此达成了共识：我国的住房制度，必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住房必须实现商品化、社会化；房改的根本目的就是为加快住房建设，改善居住条件，满足城镇居民不断增长的住房需求。

房改十四年的实践和中央最新的《决定》中都作了如下明确的规定：职工以市场价购买的住房，产权归个人；个人房产可以进入市场，按规定缴纳有关税费后，收入归个人；职工以成本价购买的住房，产权归个人，一般五年后可依法进入市场，价格可放开，在补交土地出让金和按规定缴纳有关税费后，收入归个人……

中国的房改，在允许私人拥有不动产上取得了重大突破。

禁区之二：“美国梦”， 有没有其合理成分？

《美国寻梦》是美国著名记者特克尔的名著。在这本尖锐、坦率批评美国社会的书中，特克尔如实记下了几位美国人的住房梦：

——埃德·萨德劳斯基，39岁（美国记者采访他时的年龄，下同），钢铁工人，住美国芝加哥，他说：在学校里读书的时候，老师就教育你要靠自我奋斗创造自己的前途，要培养一种坚韧不拔的工作精神。老师说，吃大苦、流大汗，就有成功之日。老师还说，人们评价你的标准就是看你能捞到多少东西。如果一个人拥有一栋三楼三底的洋房，人家就会认为他真神气——我和同学们从小就在脑瓜里灌满了这一套东西……因此我的美国梦就是想买一块地，盖一套属于自己的住宅。

记者则在北京碰到过40岁的汪女士，她是从台湾移居美国的华人，前些年，她和自己的先生购买了一套价值25万美元的别墅，一期缴纳的定金是5万美元（必须有证明，证明购房者有固定经济收入），然后是分期付款，整个还款期限为15年。汪女士说：我和先生必须不停地干，以保证把贷款和利息全部按期还清，否则，房子是要被收回去的。我这一辈子，就想给儿女们留下一套房产。

美国的“机制”当然绝非十全十

美，但北京市房改办苗乐如副主任在谈及美国人的买房、盖房梦时，讲了这么一句话：这也许就是美国社会促使人们努力工作的“原动力”之一吧。

中国有没有这种促使人们努力工作的“机制”呢？

有的。国务院房改办主任陈学斌讲述的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的住房梦，和美国人的住房梦极为相似。

陈主任说，中国农民从古至今都是凭着节衣缩食来盖房娶亲、繁衍子孙。有人或许会嘲笑中国的农民：盖房子、娶妻子、生娃子；生下娃子长大了，又是盖房子、娶妻子、生娃子……如此循环往复，中国的农民似乎缺少一点“潇洒”。

但是，中国的城里人没有权力笑话农民弟兄——新中国的农民兄弟在住房问题上，从来没有依赖过各级政府。

为了验证陈主任讲述的这一话题，记者特意跑了一趟北京郊区。在北京通县曹村，乡亲们围着刚进村的记者，指着一户房子盖得最漂亮的人家说：你去老谭家吧，他家的房子最好。

老谭，大名谭宝海，今年43岁。1993年秋，他开始实施自己毕生的梦想了：盖一栋全村最好的房，为儿子娶一房最好的媳妇，生一个最聪明、最伶俐的儿子（“要像你们记者这样，读书的”）。

七间正房、三间厢房，老谭总共花了近6万元，他家里几乎还没

有任何家具。为盖房，他不仅脱了三层皮，还欠着一万多元的债务。看看村里的其他人家，富裕起来的京郊农民们，房子都不错，但家中的电器水平，至少和城里人差着十几年！

乡下人把吃饭排在了第一位，把盖房排在了第二位。农民说以食为天，以居为地。一“天”一“地”，显示着吃饭和住房的重要。

城里人则有些不同，因为国家把住房问题“包”了下来，于是城里人往往较少为住宅操心（除了特困户），有了节余的钱，城里人就把“用”字排在了第二位，家具，要组合柜、矮柜及各式沙发；彩电，要25甚至29英寸以上的“画王”；洗衣机要全自动的；冰箱要双开门甚至三开门、抽屉式的；空调要分体式甚至进口的；音响要成套、高档的……

敲开北京城里任何一位与谭宝海年龄相仿的中年人的家，其家中电器及各种“用具”肯定不少于一万元，但是，在住房问题上，北京城里的绝大多数中年人无法望谭宝海之项背！

据统计，我国农村居民1992年住房消费，已占到其家庭总收入的10.34%，这一百分比与18%的世界水平相比已较为接近，而同期我国城镇居民的住房消费仅占家庭总收入的0.86%——这是一个尖锐的问题，住房仍处在“赤贫”阶段的城里人，要不要改变自己的消费观念？

国务院房改办主任陈学斌的回答是：一定要，城镇居民再不能把自己的住房一块块地“掰”了、“吃”了。

禁区之三：公有住房中，有没有老职工的“一份”？

中国城市居民消费观念的这种扭曲，责任并不在老百姓身上。

既然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不把住房看作商品，既然社会主义的住房是要由单位来统一建设、统一分配的，那么在实行低工资、低消费的计划经济时代，城市职工的工资构成中便只有吃饭、穿衣、上学、行路的钱，其中没有买房的钱。

国务院房改办主任陈学斌说，那时一个大学生毕业之后才挣46元，第二年转正挣56元，让他自己去攒钱买房，不是天方夜谭么？

在他辛勤工作几乎整整一生之后，要让他以成本价甚至是商品房价格买下他住的房子，于情于理合适么？老工人、老干部，他几十年的劳动中，国家或者企业扣除了他的一部分工资，统一拿去建了房；现在住房政策要改，政府和企业难道不该把过去扣除的那部分，再返还给老工人、老干部吗？一位职工，正常工作四十年，难道在他离开工作岗位时不该得到一处栖身之所吗？

陈主任说，如果你承认这种分析有“理”，那么我们在卖房过程中给予职工以工龄的优惠就有了最合